

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 戰時日本對冀東的「三光作戰」(1937-1945)

李恩涵\*

### 提 要

本文為作者研究戰時日本軍對華北「三光作戰」問題的第五篇論文；惟本論題在最近十餘年間曾頗有中、日學者的研究論著與系統性的回憶紀述行世，但真正能夠給合中、日、英文中的原始資料與第二手資料的綜合性深入研究，則尚乏新著刊佈。這就是本文撰寫的目的所在。

日軍對冀東的「三光作戰」，首在圖謀肅清北寧鐵路（北平／山海關）之南的共軍活動；其次，則想肅清北寧鐵路以北至長城線之間的共軍活動；最後，他們是想肅清長城線附近及線北的共軍活動，以保證偽滿洲國的所謂「西南國境地區」的安全。在第二步驟與第三步驟的行動中，日軍都曾在冀東的相關地區內實施大規模地、大面積範圍地「三光作戰」（殺光、燒光、搶光）——製造大面積範圍的「無人區」（「無住地帶」），其手段是非常非常殘酷。惟日軍在冀東的「三光作戰」並未達到其戰略上的目的。在1945年8月日本向中、美、蘇軍投降時，中共在冀東、熱南的軍民總實力，仍有增加，並未減少。戰爭末期蘇聯軍迅速擊潰日本關東軍而攻占東北四省之後，首批配合蘇軍收復遼寧等省部分地區的中國軍隊，即為來自冀東地區，曾經在長城內外抗敵多年，飽經風霜與艱苦的李運昌部。

**關鍵詞：**戰時日本暴行 三光作戰 冀東 岡村寧次 李運昌

---

\*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有關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1931-1937-1945)日本軍在華「三光作戰(政策)」問題的資料，中、日、英文戰時出版的報紙、雜誌與時人的紀錄憶述，實相當廣泛，戰後以中、日、英文發表的有關公、私資料、檔案，即只論其主要者，也是卷帙浩繁，<sup>1</sup>而戰後中、日及西方學者對於「三光作戰」的研究論著，也相當不少；<sup>2</sup>而有關日軍在冀東的「三光作戰」的研究，陳平個人的回憶紀述及他與日本學者

<sup>1</sup> 中文中記述「三光作戰」的，見《解放日報》(延安)1941年7月7日、9月25日及其他各日的記述，《新華日報》(太行版)，1944年8月15日及在此之前與在此之後的不同年、月、日的報導；《晉察冀日報》1940-1945年各月、日的報導。戰後編輯原始資料者，則有河北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輯》，上、下(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劉健清等編，《華北抗日根據地紀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陳斐琴編，《巍巍太行》(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4)；《八路軍回憶史料》(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北京人民出版社編，《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概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劉伯承，《劉伯承回憶錄》(上海：新華書店，1981)及第二、三冊；中央檔案館等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共三冊，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1)；洪桂已編，《日本在華暴行錄》(台北：國史館，1985)；左祿編，《侵華日軍大屠殺實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日文中記述「三光作戰」的主要檔案與憶述資料，則包括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北支の治安戰(1)、(2)》(東京：朝雲出版社，1984)；小林龍夫等編，《現代史資料(9)、(12)：日中戰爭二、四》(東京：みすず書店，1964、1965)；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史資料集 1939.9./1941.12》等10冊(東京：勁草書房，1974)；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編，《三光》(東京：光文社，1957)；該書的其他增訂版本，則有《侵略——從軍兵士の證言》(東京：日本青年出版社，1970)；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編，《完全版：三光》(東京：晚聲社，1984)。另有平岡正明，《日本軍は中國で何をしたか》，潮出版社1972；本多勝一，《中國の旅》(東京：朝日新聞社，1972)；同作者，《天皇 軍隊》(朝日文庫版，1974)；森山康平《證言紀錄：三光作戰》(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75)等等。英文中當時英、美報章的記者，對於日本三光作戰的記述，可查閱Edgar Snow, *The Battle for Asia* (N.Y.: Random House, 1940); Theodore H., White &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Y.: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1946); 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Y.: Henry Holt & Co., 1945); John B. Powell,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N.Y.: MacMillan, 1945); Frank Dorn,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0;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N.Y.: MacMillan, 1974); David Bergamini,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London: Heinemann, 1971)及查閱*North China Herald*與*China Weekly Review 1940-1941*年各期的零散記載。

<sup>2</sup> 中文中，如魏宏運、左志遠編，《華北抗日根據地史》(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羅煥

姬田光義合撰《もうひとつの三光作戰》(1989)與姬田光義撰《日本軍による「三光政策・三光作戰」をめぐる》(1993);藤原彰,《「三光作戰」北支那方面軍》見《季刊:戰爭責任研究》,20、21號(1998年6月、9月);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と三光作戰》(1999)等外,<sup>3</sup>多年來能夠綜合中、日、英文中的原始與第二手資料的較比全面性的深入研究,實尚無新著問世。這就是本文撰寫的目的所在。

就現所確知的各種檔案與不同來源的資料而言,我們可以確定地說,「三光作戰/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為日本軍隊在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所犯的嚴重罪行之一,是對於中國抗日的一定地區(特別在華北中共抗日游擊區內)有系統地、大規模殺戮非戰鬥人員(自然也包括戰鬥人員)的居民與破壞區內公私房

---

章、支紹曾,《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編,《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的暴行》(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陳平《一個特殊的戰略地帶——「無人區」》,見《河北文史資料》第12輯(中國政協河北省委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冀熱遼抗日根據地研究論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惟本文作者迄未閱及此書);本作者自1993年之後所撰寫出版的《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對晉東北、冀西、冀中的「三光作戰」》(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期,下冊(1993年6月)等論文4篇(見李恩涵,《戰時日本販毒與「三光作戰」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日本學者有關「三光作戰」的研究,則有江口圭一《十五年戰爭小史》(1986);同作者的《中國戰線の日本兵》,見藤原彰等編,《十五年戰爭(2):日中戰爭》(東京:青木書店,1989);姬田光義、陳平《もうひとつの三光作戰》(東京:青木書店,1989);姬田光義,《日本軍による「三光政策、三光作戰」をめぐる》,見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日中戰爭:日本、中國、アメリカ》(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1993);藤原彰,《「三光作戰」と北支那方面軍》,見《季刊:戰爭責任研究》第20、21號(1998年6月、9月);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と三光作戰》(東京:大月書店,1999)等等。英文論著中涉及日本「三光作戰」的,則有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62); Tetsuya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Lloyd E. Eastman, "Fac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Smuggling, Puppets and Atrocities during the War, 1937-1945", in Akira Iriye, ed.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0); Lyman Van Slyke,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Republican Period, 1912-1949, Part 2, eds. John K. Fairbank & Albert Feuerwerk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6)等等。

<sup>3</sup> 參閱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 三光作戰》,頁83,87。

舍、糧秣與其他物資設備的總稱；其所表現的野蠻殘暴程度，實在人類史上留下一頁不可抹滅的污點。該「三光作戰」（或「三光」）一辭，雖然係來自於當時中共的黨政通告與傳播媒介根據日軍對中共游擊區「掃蕩戰」中殘酷屠殺與破壞的事實而予以概括化的一項中國名辭，在日本作戰命令與術語中，則稱之為「燼滅作戰」、「徹底的肅正作戰（討伐）」、「徹底覆（討）滅」、「討滅作戰」、「掃蕩作戰」、「剔抉掃蕩作戰」、「治安肅正作戰」、「治安強化作戰」等等；<sup>4</sup>其實這兩套辭彙的意義，實際是非常接近、或是幾乎完全一樣的。到現在為止，我們尚無法發現日軍對「三光作戰」的最早、官階最高的原始命令文件，這是由於日軍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降伏之初，曾經大規模有系統的湮滅種種軍事證據的關係，<sup>5</sup>但個別地、散漫地、較低軍階的原始命令，如 1940 年駐紮山西的日軍獨立混成第四旅團昭和 15 年（1940）9 月〈第一期晉中（太行山南部）作戰詳報〉與該旅團長所下〈討伐隊注意事項〉的命令中所云，仍可見其端倪。<sup>6</sup>我們也可確定地說：此「三光作戰」實為將 1937 年 7 月 7 日中日全面戰爭（不宣而戰）展開之後，日軍在華對抗日地區普遍地不同規模的屠殺、焚燒與破壞，一變而為有系統、有組織的較大規模的焚燒與破壞，以謀徹底摧毀中國軍民抗日的戰鬥意志與其物資基礎。此「三光作戰」的始作俑者，是戰前多年擔任侵略華北的前鋒、開戰後於 1939 年 9 月出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的多田駿（中將，後升大將）。此後繼續擴大「三光」使其達到暴行的高峰期的，則是 1941 年 7 月接繼多田駿之後擔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大將）。<sup>7</sup>該「三光作戰」的重心區雖然在中共晉察冀地區的晉東北、冀中與

<sup>4</sup> 參閱李恩涵，《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台北：商務印書館，1994），頁 210-211；李恩涵，《戰時日本販毒與「三光作戰」研究》，頁 179-180；另參閱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と三光作戰》，頁 77。

<sup>5</sup> 參閱李恩涵，《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頁 109-110。即就小範圍的偽滿熱河省政府而言，日本投降後，該府即將所藏重要檔案文件，連燒兩天兩夜（見姬田光義、陳平，《もうひとつの三光作戰》，頁 52。

<sup>6</sup> 江口圭一，〈中國戰線 日本軍〉，見藤原彰等編，《十五年戰爭：日中戰爭》（東京：青木書店，1988），頁 61；另參閱李恩涵，〈抗戰期間日軍在華北的「三光作戰」暴行〉，見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第三屆討論會》（台北：國史館，1995），頁 1-2。

<sup>7</sup> 參閱李恩涵，前文，頁 3-13；另參閱李恩涵，《戰時日本販毒與「三光作戰」研究》，頁 186-187, 204, 209。

晉冀魯豫地區的晉東

南、冀南、魯西與山東的沂蒙山區，<sup>8</sup>但冀東在戰略位置上既為日本認為極其重要，在實施「三光作戰」中也在一處極為嚴酷典型的案例之一。

—

冀東在地理上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係指北平以東以至山海關之線以北至長城線、以南至渤海之濱的 22 個縣、總面積約為 12 萬平方公里的地區。但本文所討論的戰時的冀東，則包括長城線以北的熱河南部與遼寧西部及西北地區（即當時晉察冀邊區的冀察熱軍分區）。而自日本方面的政區劃分而言，自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即很快占據了我國的東三省；又於 1932 年 9 月成立了偽滿洲國；次年（1933）1 月更進侵熱河全境（3 月承德淪陷），將熱河強併為偽滿的一部分。熱南、遼西與遼西北均成為偽滿所謂的「西南國境地帶」，在地緣戰略上居有防護偽滿西南安全的重要地位。1933 年 5 月 31 日，中日簽訂塘沽協定，則將冀東地區變為「非軍事化」與「特殊化」。兩年多之後，日本甚至在冀東成立了偽滿式的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以為偽滿與華北的緩衝地帶。<sup>9</sup>

1937 年 7 月 7 日中日進入全面性不宣而戰之後，中共新編成的八路軍 115 師、120 師、129 師即全面東進進入敵後的晉東北、察南、晉西北、冀西、冀中、晉東南、冀南、魯西等地；同年 11 月，115 師副師長聶榮臻率部 3,000 人在晉東北的五台山山區成立了晉察冀軍區，又成立了東進挺身縱隊、山東縱隊、北方挺身隊等，以迅速擴展實力。同年年底，已分建了太岳（晉東北）、冀中、冀熱遼（冀東、熱南）等三個軍分區。<sup>10</sup>約略於同時的 1937 年 10 月，中共冀豫晉省委成立，是年

<sup>8</sup> 參閱李恩涵，前書，頁 178-307 之〈日軍在華北的「三光作戰」暴行〉、〈日軍對晉東北、冀西、冀中的「三光作戰」〉、〈日軍對晉東南、冀南、魯西的「三光作戰」〉、〈日軍對山東的「掃蕩」戰與「三光作戰」〉等 4 篇論文。

<sup>9</sup> 李恩涵，前書，頁 59。

<sup>10</sup>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大戰前之華北治安作戰(一)》(原名《北支の治安戰》，1984)，(台北：史政編譯局，1988)，頁 148；草野文君，《支那邊區の研究》(東京：國民社，昭和 19 年 1944)，頁 7, 165。

11 月，共軍 129 師則南進深入太行山，開闢了以太行山為依託的晉冀魯豫地區。<sup>11</sup> 日本情報稱，毛澤東（八路軍）的游擊戰法，係實行「將兵一致、軍民一致、爭取敵偽軍」等三大原則，主張將軍力用於側面與後方作戰，但不反對以一部分（不用主力）用於正面作戰；在戰術上主採包圍、迂迴戰法，作獨立自主的對敵作戰，以保存自己的力量而消滅敵人的力量，若應用之於敵人的後方則威力特大，以擾亂或切斷敵人的運輸線與基地。正面作戰時，決不取「單純防禦（專守防禦）」的戰法，而採「反擊戰法」；又引毛氏之言：「我們的戰術，決非單純的游擊戰，而是運動戰、陣地戰與游擊戰之交互運用」。<sup>12</sup>

就中共在冀東的發展而言，早在七七事變之前兩個月，中共地下黨員李運昌（1908 年生，又名芳岐、鳳鳴，河北樂亭人，1924 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 年入黃埔軍校，同年加入中共）即報告，該區潛伏的抗日武力已有槍 22 萬枝至 25 萬枝之多。1937 年 7 月 6 日至 7 日，在李運昌與其他國民黨抗日領袖的領導下，更組織發動開灤煤礦礦工及冀東七縣老百姓 20 萬人之眾的抗日大暴動，組成 7 萬至 10 萬人的冀東抗日聯軍（其他受國民黨領導的抗日軍有 3 萬人），在冀東十七縣之內發動游擊戰。至同年 10 月上旬，始因受到挫敗，無力支持而向西方撤退，當地數約 500 人的中共黨組織也隨之瓦解。惟李運昌所領導的第 3 支隊 3,000~5,000 人仍留在冀東游擊抗日，後更併入八路軍的行列，稱第 13 支隊（後改稱第 12 團）。<sup>13</sup>

1938 年春，晉察冀軍區的第 4 縱隊鄧（華）宋（時輪）支隊 600 人（一說 5,000 多人）潛入北平之北的房山山地，又自房山發展至良鄉、涿州、涞源等縣；同年 5 月，更進入冀東，在熱河西南部的燕山山區建立霧靈山根據地，向偽滿境內滲透發展。<sup>14</sup>惟該根據地很快受到偽滿軍的進攻掃蕩，遭受到很大的損失；1938 年秋，

---

<sup>11</sup> 魏宏運、左志遠主編，《華北抗日根據地史》（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頁 49。

<sup>12</sup> 草野文男，前書，頁 174-176。

<sup>13</sup> 姬田光義、陳平，《もうひとつの三光作戰》，頁 96-97, 102；另參閱羅煥章、支紹曾，《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頁 94；藤井高美，《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序說》（京都：嵯峨野書院，昭和 58 年 1983），頁 163。

<sup>14</sup> 草野文男，前書，頁 23-24。

乃折返山西。<sup>15</sup>同年 12 月，中共 120 師副師長蕭克所統率的北上挺進軍又進入冀東，沿長城線逐步擴大地盤，展開游擊戰。該軍雖然很快自原來的 600 人擴增至 3 萬人之眾，但其裝備甚差，平均每 5 個人才有一枝步槍。<sup>16</sup>所以，當 1940 年春晉察冀邊區冀東軍分區成立時，仍以李運昌為司令員，包森副之，下轄第 11 團、第 12 團與第 13 團，總兵力約 2,000 人。其他有政治人員 200 人，〔便衣〕游擊隊 200 人。蕭克則改任平西軍分區司令員。<sup>17</sup>

1938 年 11 月，日軍首次對冀東開始了殘酷的「掃蕩」，至 1939 年 6 月止，共發動過五次大圍攻，前四次所用兵力各約為 5,000-6,000 人，第五次則出動兵力達 2 萬多人。<sup>18</sup> 1939 年冬，日軍又在李運昌第 2 支隊活動區的熱南長城線北側的興隆縣根據地內，燒毀破壞民居——這有些類似最初形式的「無人區」，強徙居民至集中營式的「集團部落」。<sup>19</sup>這類最初型式的「無人區」，顯然係仿自偽滿的東邊道（通化、撫松地區）之例，雖然也略微做些修正：因為至 1939 年，滿洲東邊道等地已建立起「集團部落」（集中村）達 13,451 處，每「部落」約有 40-50 戶至 150 戶。「部落」原則上為正方形，設砲台、圍壕、土壁、鐵絲網等防禦設備。砲台的構造，以長 35 尺、寬 30 尺、高 8 尺之橢圓形為基礎，有外圍 2 尺、長 1 丈的砲坑，其上則為建坪 15 平方尺的二台階、長 11 尺的砲台。<sup>20</sup>至 1940 年日偽在熱南實行較大範圍的「集家併村」之前，熱南興隆縣沿長城之線的冷嘴子、八仙桌子、花布、大小黃岩等關口附近及橫河、黑河上游一帶已開始「集家併村」了，如將籃旗營子鄉北榆樹溝內的幾個小鄉村集併到楊樹台村，將橫河川北部山區的羊羔峪、水泉等二十多個山村集併到鞍子嶺村與雙爐台村，在羊羔峪建立起「部落」，派日偽軍駐守。惟中共軍的勢力在熱南長城線區的發展，並未受到阻止；至 1941 年秋迄 1942 年秋的期間，中共在霧靈山、五指山、都山（在承德白馬川之南）三

<sup>15</sup> 《大戰前之華北治安作戰(一)》，頁 151, 736-737。

<sup>16</sup> 草野文男，前書，頁 24。

<sup>17</sup> 《大戰前之華北治安作戰(一)》，頁 736-737。

<sup>18</sup> 袁旭、李興仁等編，《第二次中日戰爭紀事，1931.9./1945.9.》（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頁 174。

<sup>19</sup> 姬田光義、陳平，前書，頁 118-119。

<sup>20</sup> 前書，頁 91-93。

大根據地，已可連成一片，形成在熱南的一處相當大的控制區。<sup>21</sup>

## 二

1938 年至 1939 年 9 月期間的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為杉山元〔大將〕（他是七七事變前後力主一個月或至多三個月「一擊論」即可解決中國抗日問題的陸相）、參謀長為山下奉文（中將，為日陸軍中皇道派的中堅份子，後為進占馬來亞、新加坡的「馬來亞之虎」）、參謀副長為武藤章（為日陸軍中機謀百出、野心勃勃於對外侵略的少壯熱狂份子，有「東條英機的沖激力（大腦）」之譽）。在三人密切的配合下，頗想一舉廓清華北各地區的國、共抗日游擊武力。<sup>22</sup>所以，即使在日軍尚未占領武漢之前的 1938 年 4 月，他們即已下令出動 12,000 多人，分四路進攻國、共在晉中、晉東南、冀西新建立的各抗日游擊區，企圖以餓虎撲羊之勢個別予以擊潰與擊滅。<sup>23</sup>同時（1938 年 4 月），更出動 3 萬多人分九路進攻晉東北的五台山區，再轉而攻進冀西，沿途殺人、燒掠、破壞，無所不為。<sup>24</sup>特別自 1938 年 10 月占領武漢之後，日軍在所訂「昭和十三年(1938)秋季以降對支處理方案」中，更確定要恢復占領區的治安、強化對華北抗日游擊根據地的攻擊，所以，山下奉文等在擬定 1939 年（昭和 14 年度）華北三期（1939 年 1 月至 1940 年 3 月）肅清計劃之後，很快雷厲實行進攻。1939 年春季後，日軍不只重新大舉進攻晉東北與太行山北部的太岳區，也同時進攻冀中、晉西北、冀南與山東沂蒙山區，並在各區實施連續不間斷的進攻「掃蕩」。原駐冀東的第 110 師團則調攻冀西北（太岳區），

<sup>21</sup> 陳平，〈長城線上「千里無人區」〉，見《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 2 冊，頁 598-599。

<sup>22</sup> 《大戰前之華北治安作戰(一)》，頁 221；另參閱 Yale C. Maxon, *Control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 Study of Civil-Military Rivalry, 1930-1945*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 pp.140-141, 143。

<sup>23</sup> 參閱藤井高美，前書，頁 164；李達，《抗日戰爭中的 129 師》（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 103。

<sup>24</sup> 聶榮臻，〈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見《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第 2 冊，頁 7-8。李恩涵，《戰時日本販毒與「三光作戰」研究》，頁 201-202。



由獨立混成第 27 旅團專任冀東防務及「掃蕩」工作。<sup>25</sup>初期日軍對於中共軍是極為輕視的，只認他們為殘餘兵或抗日匪團之類的武裝力量；因而對之採取逕直包圍與突擊戰術；<sup>26</sup>又因為日本認為 1940 年將為結束對華戰爭之年，一面積極培育汪精衛政權，以華制華，一面計劃與蔣介石談和；在華北則想「以武力為中心之討伐肅清，……必須完全掌握民心，獲得民眾之悅服」。<sup>27</sup>

所以，中共為牽制日軍在華中的進攻、增進重慶國府抗日的士氣與打擊汪偽政權的氣燄，乃於 1940 年 8 月 20 日至 12 月 5 日之間的 110 多天內，約略同時在正太路、平漢路、同蒲路、白晉路、北寧路、滄石路、津浦路、膠濟路等發動交通破襲戰的「百團大戰」，使日軍守備的各鐵路線與沿線重要礦場設備，遭受相當大的損失。<sup>28</sup>在此期間，冀東共軍則發動民兵八萬人在境內七、八個縣境之內，破壞日、偽控制的公路與電線，一時遵化城被封鎖達 25 天，城內日軍因燃料供應被切斷，乃燒門窗取暖。<sup>29</sup>當時李運昌部有約 1,000 人在北寧路（京奉路）北的豐潤、遵化一帶游動，有時也在鐵路線上的溧縣與路南的樂亭一帶活動；所以，豐潤、遵化一帶的治安，被認為最不好。<sup>30</sup> 1941 年初，共軍更集中攻擊駐紮唐山、輔助日軍擔任第一線防共的偽治安軍（老軍閥齊燮元部），使之蒙受甚大的損失。<sup>31</sup>日

<sup>25</sup> 藤原彰、野澤豐編，《日本ファシズムと東アジア——現代史シンポジウム》（東京：青木書店，1977），頁 179, 184-185；另參閱《大戰前之華北治安作戰（一）》，頁 131, 225-226, 228-242, 290, 377-387；另參閱李恩涵，《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頁 213-214；姬田光義、陳平，《もうひとつの三光作戰》，頁 87。

<sup>26</sup> Michael Lindsay, *Notes on Educational Problems in Communist China, 1941-1947*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50), p.10；石島紀之，〈關於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和它的國內國際條件〉，見南開大學歷史系編，《抗日根據地國際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頁 73。

<sup>27</sup> 《大戰前之華北治安作戰（一）》，頁 201, 115。

<sup>28</sup> Tetsuya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p.217-219, 220；李恩涵，《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頁 215-216。

<sup>29</sup> 藤井高美，《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序說》，頁 165。

<sup>30</sup> 鈴木啟久，〈我在冀東任職期間的軍事行動〉（為在中國戰犯拘留營中自白書之一部分），見《河北文史資料》第 12 輯（中國政協河北省委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頁 119。

<sup>31</sup> 同上文，頁 117。

軍也常有小部隊在豐、遵之間被共軍伏擊殲滅之。<sup>32</sup>當時駐紮冀東的日軍 117 師團獨立第 27 旅團，實際駐在冀東的只有一個聯隊（第 1 聯隊，約 3,000-4,000 人），以唐山市的交通大學校址為司令部；其師團主力既遠在津浦路地區屯駐，27 旅團部也遠駐於河北滄縣；旅團長則指揮其第 2 聯隊，駐在天津；其第 3 聯隊更遠駐於河南省境內，駐紮於唐山的第 1 聯隊則由師團長本間正晴〔中將〕直轄。<sup>33</sup>但為報復中共的「百團大戰」的交通破襲戰，1941 年 5 月，第 27 旅團（第 1 聯隊）也開始進攻流動於樂亭的李運昌部。<sup>34</sup>

### 三

百團大戰後，日軍除加強了新築堡壘工事、改進「掃蕩」戰術外，很快即發動對晉中、晉東北、晉東南、平西（冀西）、晉西北、冀中和冀南的全面性進攻，以為報復，運用捕捉奇襲、縱橫清剿、輾轉抉剔、鐵壁合圍、反轉電擊、梳篦戰術等向共軍各根據地展開殘酷地大破壞式的進攻——這就是最初形式的、有系統的、有組織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作戰」。<sup>35</sup>與此「三光作戰」相配合的，則為仿自三十年代國民黨軍對江西蘇區進攻時所用「圍困戰術」時所實施的「治安強化運動」（計連續 5 次，自 1941 年 3 月至 1942 年 11 月）。<sup>36</sup>稍後，日軍也在作戰順序上居於稍後的冀東，發動進攻「掃蕩」。1941 年 1 月，日陸相東條英機與參謀總長杉山元會談，確定擬將侵略中國問題儘早解決（一面強力作戰、一面誘和、一面以華制華），並制定「對華長期作戰指導計劃」，擬於 1941 年秋後轉入長

<sup>32</sup> 同上文，頁 126-127。

<sup>33</sup> 同上文，頁 115, 119-120。

<sup>34</sup> 同上註。

<sup>35</sup> 李恩涵，《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頁 216；另參閱美軍上校、戰時在中國觀戰的 Frank Dorn 所著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1: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N.Y.: MacMillan, 1974), pp.342-343. Dorn 認為日本對中共「百團大戰」的報復為「極端野蠻與惡毒」(one of extreme brutality and viciousness)，但中共軍本身的損失少，老百姓則因被殺、房屋被毀、糧食被服被燒而損失重大。

<sup>36</sup> 參閱 Lindsay, *op. cit.*, p.10; Tetsuya Kataoka, *op. cit.* p.268, note 15; 藤原彰、野澤豐編，《日本ファシズムと東アジア——現代史シンポジウム》，頁 185-186。

期持久態勢，惟仍毫不放鬆的對華施加壓力。在各占領區以肅清占領為主，但不進行大規模地進攻作戰。<sup>37</sup>換言之，此後日軍作戰將以對付中共游擊武力為重心。華北日軍於 1941 年夏所定的「肅正建設三年計劃」中，則劃分華北全區為「治安區」（日占區）、「准治安區」（游擊區）、「未治安區」（中共與國民黨的根據地區）三類，要在三年內將當時占 10% 的「治安區」，擴大為 70%；占 60% 的「准治安區」縮小為 20%；占 30% 的「未治安區」縮小為 10%。<sup>38</sup>

1941 年 10 月 3 日，日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他於是年 7 月 7 日接任此職）下令：對魯西、冀東、冀中、晉察冀邊（冀西、平北）、魯南（沂蒙）、晉東南（太行）、晉南（沁河流域）等區展開大地區連續不斷的「肅正討伐」。其方面軍參謀長則進一步指示：在掃清國軍衛立煌部的大會戰之後，目下攻擊重點為中共軍，要在武力戰之外，尚應進行活潑的政略戰、經濟戰、謀略戰、思想戰等等。<sup>39</sup>而且，日本開始從戰略的觀點來看冀東，認為在保護偽滿洲國與保護冀東經濟要區的開灤煤礦與長蘆鹽區等方面，實具有很重大的戰略意義。<sup>40</sup>從 1941 年 8 月 13 日開始，日軍只在北岳區與平西區（冀西）即動用了 5 個師團與 6 個旅團之一部分和一部分偽軍，共 7 萬多人、進行了號稱「百萬大戰」，由岡村親自指揮的一次大「掃蕩戰」。<sup>41</sup>而在此稍前的 9 月 11 日，日軍 1 萬多人則將開始「掃蕩」在長城線上的白河堡（靖安堡）向東至古北口及將古北口之西的長城內外，約 50 平方公里的地區，劃定為「無住地帶」（無人區）。同年冬，線以北的熱河興隆縣的「無人區」也開始劃定。<sup>42</sup>1941 年 12 月，岡村下令第 117 師團應確保冀東的治安，所以其在冀東的兵力很快即有所增強，將該師團原所負責自鄰近冀中區以至冀熱邊境間遼闊地區的防務，予以縮小，此後即將重點移至冀熱邊境一帶。<sup>43</sup>該師團所屬 27 旅團之全部兵力均調至冀東，其師團長的戰鬥司令部改移唐山，27 旅團為指揮

<sup>37</sup> 參閱羅煥章、支紹曾，《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頁 259。

<sup>38</sup>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北支の治安戰》（東京：朝雲新聞社，昭和 43 年 1968；昭和 59 年 1984 年增刷），頁 533；Tetsuya Kataoka, *op. cit.*, p.268。

<sup>39</sup> 《北支の治安戰》，頁 572；另參閱藤井高美，前書，頁 180-183, 186-188。

<sup>40</sup> 鈴木啟久，《我在冀東任職期間的軍事行動》，頁 121。

<sup>41</sup> 參閱《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 3 冊，頁 136；李恩涵，前書，頁 218-219。

<sup>42</sup> 姬田光義、陳平，《もうひとつの三光作戰》，頁 123-124。

<sup>43</sup> 鈴木啟久，前文，頁 121, 125。

與鼓勵其第一線部隊的作戰，則將其作戰旅團部設置於豐潤。<sup>44</sup> 1942 年 1 月，更以第 1 聯隊為主力，自豐潤向北進攻，另以自天津調來的第 2 聯隊為輔助，自北寧線上的胥各莊向玉田北部「掃蕩」，展開了對共軍李運昌的全面「掃蕩」；另以第 3 聯隊佈防於北寧路上的鐵廠／五官營之線的東部擔任攔截外逃共軍任務。因為根據第 27 旅團長鈴木啓久〔少將〕的判斷，中共軍主力應在北寧路之北，在路南的兵力，則極薄弱，無大部隊的流動。因此，他乃對路北實施嚴密封鎖，以日軍所駐紮的唐山、古冶、林西、胥各莊為重心，嚴禁日常必需品的鹽與其他物品北運，並破壞豐潤至玉田和唐山的公路；惟走私的鹽仍然可以自胥各莊之南以獨輪小車沿小路運往。<sup>45</sup>而進攻「掃蕩」中的日軍，先即在遵化劉備寨村屠殺村民數十人，<sup>46</sup>又在熱南寬城碾子峪、大屯村一帶，逐戶殺人燒屋，在僅僅 5 個小時內就把大屯村全村 460 名村民中的 187 人予以殺死或燒死，燒毀房屋 500 多間。<sup>47</sup> 1942 年 2 月中旬，因見大隊中共軍逃至遵化魯家峪村的舊礦窯附近，即告消失，而此類礦洞附近共有 19 個之多，尚有其他可供潛逃的地道等；鈴木啓久乃下令「徹底殲滅」，以村民通敵為名，用殺、燒、毒瓦斯慘殺 200 多人（一說日軍集中村民 700-800 人於該村廣場，以 4 挺機槍威脅之，凡不講八路軍去向的即槍殺之，但全村一個都不講），燒房 1,900 多間，並大肆強姦婦女，甚至有破孕婦之腹的殘忍暴行。該部日軍另在施放毒氣彈攻擊窯洞時，也至少殺死了共區軍民 1,000 多人。<sup>48</sup> 同年 10 月，日軍更在潘家戴莊將村民 1,280 多人推入預掘的深坑內，活埋燒死。<sup>49</sup>

日本關東軍也與華北日軍密切合作，維持互動配合的關係。1941 年 9 月，關東軍西南防衛司令部開始將所擬的〈西南地區肅正工作實施要綱〉，予以執行，承德日憲兵本部也制定了〈國境地區無人化〉方案，要大規模開闢具戰略性、有系統的、大規模的「無人區」，以確保此戰略要區、中「滿」邊境的安全。承德憲兵隊隊長所簽發的一份〈滅共對策資料〉中，說明「集家併村」製造「無人區」（「無

---

<sup>44</sup> 前文，頁 126-127。

<sup>45</sup> 前文，頁 123, 125。

<sup>46</sup> 前文，頁 127。

<sup>47</sup> 參閱李恩涵，《戰時日本販毒與「三光作戰」研究》，頁 431。

<sup>48</sup> 鈴木啓久，前文，頁 125, 127；另參閱姬田光義、陳平，前書，頁 26-27。

<sup>49</sup> 王俊彥，《日本戰犯審判秘聞》（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頁 436-437。

住地帶」)的目的在於「匪民隔離」,「所謂『集家』是把可能成爲敵人游擊區的國境地帶的居民集結到我方據點及附近地區,「使之完全與敵人的活動隔絕,由我方掌握,從而封鎖扼殺敵人所謂人力、物力的動員。……民眾的支持,乃彼等的依靠;這樣就切斷其與民眾聯繫的紐帶、救命之網繩,此實致命之打擊」。<sup>50</sup>

此種「無人區」(日文稱爲「無住地帶」、「無住禁作地帶」或「暫時無人村」)的所謂「匪民隔離」對付中共游擊軍的策略,早在 1933-1939 年日軍在偽滿吉林省東邊道的延吉、琿春、輯安、清源、寬甸、通化等地已通過大規模的「集家併村」而實行過。1936 年,遼寧北票市的二龍台川等 20 多個村莊,也被劃爲「無人區」。<sup>51</sup> 1940 年 10 月,原在山東作戰的第 32 師團師團長木村兵太郎奉調爲關東軍參謀長,除加強關東軍對東邊道延邊、通化一帶的「討伐」之外,又制定〈西南地區肅正工作實施要綱〉,開始在熱南配合冀東有系統地將「國境地帶無人化」。<sup>52</sup> 關內在中共晉察冀邊區境內,約略同時(1941 年 9 月),日軍也在晉、冀兩省交界處著手建立「無人區」,其目的是要遮斷冀西與晉東北的山岳區與冀中平原區的聯繫;其範圍包括從平定娘子關,經南韓莊、孟縣東山、定襄東南山區、五台,直到繁峙、靈邱南山,長約 500 多里(一說 50-60 里,約 25-30 公里)。<sup>53</sup> 在山東萊蕪魯山一帶的 412 個村莊也被劃定爲「無人區」。<sup>54</sup> 凡被劃爲「無人區」的區域,即是要迅速開始「集家併村」了,也就是血的屠殺的開始——在區內用非常殘酷的手段,實行日軍所謂「切斷根源方式之破壞」(徹底的破壞),在一定期限內將區內所有家屋予以破壞或移動,並以武力強迫區內居民遷入「部落」(新村,亦稱「人圈」),否則,逮捕之或擒殺之。在一定期限之後,如果在「無人區」內發現任何居民或一般從事農耕生產的人民,即予槍殺;在區內搶獲物資,則予論功行賞。<sup>55</sup>

根據當年駐紮密云縣白馬關的日軍中隊長舟生退助的回憶記述云:〔日軍〕作戰命令的規定與方針:爲建設「無人區」,非掃蕩討伐不可,對家屋應一律燒掉,

<sup>50</sup> 陳平,〈長城線上「千里無人區」〉,見《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 2 冊,頁 600。

<sup>51</sup> 姬田光義、陳平,前書,頁 149。

<sup>52</sup> 王俊彥,前書,頁 231;姬田光義、陳平,前書,頁 122。

<sup>53</sup> 李恩涵,《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頁 220。

<sup>54</sup> 姬田光義、陳平,前書,頁 149。

<sup>55</sup> 前書,頁 151。

對所追到的中國人，一律射殺，「不問理由，非槍殺不可」。<sup>56</sup>舟生退助描述他的中隊在「討伐」密云縣白蓮峪的情況說：

「白蓮峪已一點村莊的痕跡也沒有了。……以後意外地在山間發現一家屋，見一 70 歲的老人和兩男孩子，一為六、七歲，一為四、五歲。此老人與孫子三人尚不知危害之即將到來。該中隊之成績，即將該住屋放火全燒，老人活生生地燒殺，兩孫子叫其祖父之名，一人一人被一槍殺死」。<sup>57</sup>

前關東軍第 3 特別警備隊木村xx少佐（曾任承德憲兵隊本部特高課大尉課長），則於戰後接受中國的審判時承認當地民眾對他所控告的罪行，都是他作為特高課課長所曾犯過所應承擔的責任。因為熱南青龍縣孟子嶺石柱村一帶為中共冀東根據地的軍政中心區，也是日軍所設重點的「無住禁作地帶」，故在 1943 年 12 月的「掃蕩」中，石柱村即遭到連續的破壞，全村村民 700 人中被屠殺的有 300 人，22 戶全被殺絕。駐紮喜峰口的日軍在「掃蕩」附近王廠溝村時，在該村逮捕村民 580 人，屠殺了其中的 380 人，其他則運往滿洲為強迫勞工。<sup>58</sup>

1942 年 2 月／3 月，冀東日軍實施的「肅正計劃綱要」以配合是年 3 月全華北所展開的第 4 次治安強化運動，再度大規模地進攻冀東共軍（6 月）。參加的日軍部隊有 117 師團直屬軍、27 旅團第 2 聯隊與輕戰車隊一團，岡村寧次與 117 師團師團長與獨立第 15 旅團旅團長等均親來視察。<sup>59</sup>此役除在遵化魯家峪附近的洞窟中，擄獲了大量軍需品，並實施起空前的大搜索、大逮捕、大屠殺、大放火和大掠奪。日軍也大規模施放毒氣以對付在山間藏匿在洞窟中的共軍，只在魯家峪附近的雞冠山，即毒殺八路軍 72 人與傷病兵 95 人。<sup>60</sup>共軍則以游擊運動戰應付之：先自遵化轉移到玉田東南的李家橋，後又逃避於玉田的北方高地，不久，則游戰

---

<sup>56</sup> 前書，頁 151-152。

<sup>57</sup> 前書，頁 152。

<sup>58</sup> 前書，頁 153。

<sup>59</sup> 鈴木啟久，前文，頁 128-129。

<sup>60</sup> 姬田光義、陳平，前書，頁 28, 35。

到盤山的方向去了。<sup>61</sup>日軍第 27 旅團第 3 聯隊則在駐地灤縣沙河驛東北方約八公里地方，遭到共軍 800 人的襲擊，軍官以下數人陣亡。<sup>62</sup> 117 師團參謀長甚為震怒，乃下令：沿 1,000 多公里的長城線以南 4 公里以內的遵化、遷安二縣境內，均劃為「無人區」，所有村民，均應驅離之，嚴禁他們在區內繼續耕種或通行。他也命令在冀東治安區與准治安區內的交通要道兩側，均應修築深 2 米以上、寬 4 米以上的遮斷壕，最長以 4 公里為一間隔，並在沿遮斷壕之一段地段內，各修瞭望樓若干座，有效監視共軍，使其不能在夜間逃避監視而來去自如。遮斷壕的建築，則限期於 1942 年年底前完成。<sup>63</sup>日、偽軍因此下令強徵冀東勞工首批 60 萬人，每天都有徵集的勞工 5 萬到 6 萬人至指定地點報到，總計所徵勞工總數達 600 萬人。<sup>64</sup>該冀東遮斷壕的北界，西起燕山口附近，沿玉田與豐潤北方的山腳，以及沙河驛北側附近，直往東。至 1942 年 9 月，已完成了約 290 公里長的壕溝及約 100 座瞭望樓；至同年 12 月中旬，所有玉田以東之鐵路線北部及以西地區的遮斷壕與瞭望樓，均告完成；而唐山市東側鐵路線以南地區的溝壕與瞭望樓，也同時建好。<sup>65</sup>

1942 年 8 月，岡村寧次在一次華北方面軍兵團長會議上，甚至親自策劃趕工完成闢建「無人區」與遮斷壕的事項，並以此事作為同年 9 月開始的第 5 次治安強化運動的重要部分。為徹底封鎖冀東共軍與偽滿抗日份子的聯繫，他命令日軍監工完成沿長城線南側，東起遷安建昌營（冷口內）、經遷西、遵化、薊縣、三河、平谷、密云、懷柔至昌平縣桃峪口，長約 600 公里、寬約 8-10 公里（薊縣北部最寬為 30 公里）劃為封鎖線，重點地區則劃定「無人區」。<sup>66</sup>在中共根據地的核心基本區內，則實行「細碎切割」，製造特設特定的「無人區」（日文稱之為「暫時無

<sup>61</sup> 鈴木啟久，前文，頁 128-129。

<sup>62</sup> 前文，頁 128, 130；遵化與薊縣境內遮斷壕的修築，自石門鎮至以北的山岳地帶為寬 4-5 公尺，長 12 公里，每隔 2-3 公里即築一座瞭望樓（見《日中戰爭：日本、中國、アメリカ》，頁 110-111）。

<sup>63</sup> 鈴木啟久，前文，頁 131。

<sup>64</sup> 前文，頁 131；另參閱姬田光義，《日本軍による「三光政策、三光作戰」をめぐって》，見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日中戰爭：日本、中國アメリカ》（東京：中央大學出版社，1993），頁 111。

<sup>65</sup> 同上註。

<sup>66</sup> 陳平，〈長城線上「千里無人區」〉，頁 603-604。

人區」)，計遵化境內有 4 處，即(1)以魯家峪為中心的 5 個村；(2)以娘家廟為中心的 12 個村；(3)雞鳴村等兩個村與高拔嶺村。豐潤縣境有二處：即火石營村和與灤縣交界處的黑山溝、西新庄營等 4 個村；和以遷安西部蓮花院為中心的一處，包括豐潤縣潘家峪和灤縣華山峰等 20 多個村。還有灤縣青龍山區的趙家峪等 5 個村。<sup>67</sup>以遵化城北 25 公里的馬蘭峪至遷安以北 20 公里的建昌營一段的帶狀「無人區」來看，其寬約 4 公里、長約 100 公里。在馬蘭峪之西，則加修了一條長 200 公里、寬 8 尺、深 1 丈 5 尺的遮斷（封鎖）溝，沿溝之一定間隔地，則加建瞭望樓。<sup>68</sup>

#### 四

日軍在長城線以北開闢的「無人區」，係以熱南興隆縣為重心。因為該縣境內東有五指山，北有霧靈山，後者早自 1938 年即為共軍闢建為核心根據地，為歷次日軍掃蕩戰的重點區；前者也是此後中共發展起來的三大根據地之一。所以，興隆縣全縣在日軍的強力「掃蕩」下，雖然至 1941 年時中共軍政的組織損失甚重，但全縣三分之二的地區仍能維持「兩面政權」的統治形式——即白天為日、偽軍所支配，夜間則仍為中共軍所支配。<sup>69</sup>在 1942 年秋季日軍的大「掃蕩」中，中共冀東軍分區副司令員包森、西部地委書記田野等幹部、黨員、士兵 1,300 多人戰死。<sup>70</sup>日、偽經常在「無人區」建立後的「部落」中搜捕中共份子，以 1942 年 1 月下旬的第一次「大檢舉」為例，即逮捕了二千多人，除當場殺害 400 多人外，其餘均運往偽滿各礦場做強迫勞工。<sup>71</sup>至 1943 年 4 月至 6 月，興隆縣全境內已有約 40% 的地區被列為「無人區」，16 萬畝以上的耕地被劃為「無住禁作地帶」，200 多個村莊被全部破壞，112,000 多名村民（占全縣人口的 81%）被驅入新建的「部

---

<sup>67</sup> 前文，頁 604。

<sup>68</sup> 姬田光義、陳平，前書，頁 36。

<sup>69</sup> 前書，頁 69。

<sup>70</sup> 同上註。

<sup>71</sup> 同上註。



落」居住。<sup>72</sup>就整個長城線以北的熱南而言，早在 1942 年春季，「無人區」（「集家併村區」）的範圍，已包括自興隆縣北至承德、平泉的南部，東至寬城一帶，西自赤城之北的獨石口，經古北口至喜峰口，寬 25-30 公里的帶狀地區。<sup>73</sup>此外，興隆之北的灤平、赤城、豐寧等縣的大部分，自長安嶺東的靖安堡（白河堡），北至鷓鴣、後城一線，南至濫角、後河一線，包括大海陀山區與赤城縣（張家口之東）的黑河川、延慶縣（北平之北）的漢河川的相接地區，均被劃為「無人區」。1942 年 6 月，日軍 3,000 多人出動「掃蕩」大海陀山區，步步壓迫，反覆摧毀所發現的人、畜、房舍，有的村落被連續燒掠七、八次之多。<sup>74</sup>

同時期內，沿長城線之南的「無人區」，也被有計劃地擴大強制執行，除前述之馬蘭峪至建昌營一段外，薊縣黃岩關內一大片地區與盤山周圍 30 多個村莊、密雲縣古口以北的大片地區等，雖早在 1941 年即為偽滿劃定為「無住禁作區」，但實際還有人住，至 1942 年華北日軍則實行強制性的瘋狂的燒殺搶掠，驅使當地零散而居的村民被嚇而逃，整片面積約 1,500 平方公里的土地，變成真正的「無人區」。<sup>75</sup>

1943 年，冀東日軍與偽滿日軍更加緊合作，全面在冀東與熱南採用「拔根斷源」的毀滅性方法，擴大「無人區」；偽滿日軍甚至延長其控制的「無人區」至山海關以西 10 多公里的九門口。在青龍縣全境及凌源、建昌、綏中（地在遼西）部分地區，實行「集家併村」。從此，構成了西起獨石口（在張家口之東北）、東至九門口的一段長達 850 公里長的戰略封鎖線，將偽滿的所謂「西南國境」嚴密地保護起來，另外，向北越過承德至錦州公路在平泉、寧城、承德全境與喀喇沁旗、圍場部分地區，也實行「集家併村」，將中共軍在此區內的光頭山根據地的周圍地域劃為「無住禁作地帶」。在熱西地區，日、偽滿也將豐寧全境與隆化縣之大部分劃為「無人區」。<sup>76</sup>至 1944 年春，在長城線以北的熱南地區，日本已基本完成其「無

---

<sup>72</sup> 同書，頁 69-70。

<sup>73</sup> 同書，頁 124。

<sup>74</sup> 同書，頁 129；另參閱陳平，〈長城線上「千里無人區」〉，頁 602-603。

<sup>75</sup> 陳平，前文，頁 605。

<sup>76</sup> 陳平，前文，頁 608；另參閱藤原彰，〈三光作戰と北支那方面軍〉，見《季刊：戰爭責任研究》，第 20 號（1998 年 6 月），頁 22 稱設置無人區及修築封鎖（遮斷）溝，始自 1940

人區」的計劃：包括青龍、寬城、承德、興隆、灤平等五個縣的全境，豐寧、平泉、建昌、凌源、寧城、隆北、懷柔等七個縣的大部分，綏中、喀喇沁旗、圍場的部分地區，還有平谷、密云、延慶、赤城等縣（當時這些縣均被劃入偽滿洲國境內），以及冀東遵化馬蘭峪的所謂「滿洲國特區」，均有「無人區」的設置了。總計這些「無人區」的總面積，約共 5 萬平方公里，區內被毀滅的自然村達 17 萬多個，改建成「集體部落」達 2,506 座，被驅趕居住於「集體部落」（「部落」）的村民共達 140 多萬人。<sup>77</sup>所有在「無人區」內真正的「無住禁作地帶」，人民與家畜、家禽都應遷徙逃命，否則，為日、偽軍碰到，必殺無疑。在熱南山岳區的原中共根據地區域內，甚至一頭牛、羊、一隻雞都看不到。<sup>78</sup>薊遵興聯合縣第 6 區的小山村黃花峪，日、偽命令村民限期遷入「部落」去住，村民不搬，日、偽軍乃將全村 100 多人中的 90 多人全部殺害；另在一個山藥窖中，用火活活薰死 70 多名老人、婦女和兒童。<sup>79</sup>興隆五指山根據地的羊羔峪、驢兒叫一帶，被日軍往返燒殺 18 次（一說 22 次），許多家屋的石牆都被燒成褐色，而日軍仍不罷休，不只將石牆推倒了，還將其基石也掘出來。對於逃匿於山林中的村民，日、偽軍在「掃蕩」時常常放火燒山，森林被燒盡，河山焦土化。<sup>80</sup>對於日軍在「無人區」的種種暴行，共軍冀東軍分區司令員李運昌特於 1943 年 2 月 7 日通電向全世界控訴：日本在長城內製造「無人區」，普遍實行「集家併村」，將區內房屋燒盡，居民遭屠與凍餓而死的，已達數萬人，「這是一項世人不可漠視的暴行」。<sup>81</sup>

## 五

總計在八年抗戰(1937-1945)期間，在中共冀熱遼軍分區的冀東、熱南、平北、

---

年下半年，至 1941 年日軍已全面進行；至 1942 年及 1943 年則達到努力進行的高潮期。另參閱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と三光作戰》，頁 86-88。

<sup>77</sup> 陳平，前文，頁 611。

<sup>78</sup> 姬田光義、陳平，前書，頁 154。

<sup>79</sup> 龔古今、唐培吉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稿》（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頁 212。

<sup>80</sup> 姬田光義、陳平，前書，頁 154-155。

<sup>81</sup>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 3 冊，頁 207。

平西地區，估計約共有 35 萬人被殺害，39 萬人被抓為強迫勞工，292 萬間房屋被燒毀，損失糧食約有 166 億斤，牲畜約有 36 萬多頭，豬、羊 424 萬隻，農具、家具約 1,800 多萬件，被服約 930 萬多件。<sup>82</sup>

不過，雖然在此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該地區的軍民仍然在被劃為「無人區」的根據地內，繼續奮力戰鬥與生活下去。他們在生活上已改為穴居野處，或夜晚住在山間與曠野中的窟洞，或住在長城線上的烽火台內，而在所居之處建立起 3-5 里間、晝夜均有聯絡步哨的警報網，以防範日、偽軍的來襲；又利用石雷與掩埋於洞窟中的地雷，以反擊前來搜索的敵人。<sup>83</sup>其次，中共軍實行「精兵簡政」，在日、偽劃定為「無人區」的廣大地區內，只維持最簡單組織的聯合縣，如豐灤密縣（為豐潤、灤縣、密云三縣的聯合，但也包括了熱南的興隆縣與冀東的遵化二縣）、承平寧縣（為承德、灤平、豐寧三縣的聯合）、凌青綏縣（為凌源、青龍、綏中等三縣的聯合，但也包括了寧城、建平等縣）、遷遵青縣（為遷安、遵化、青龍三縣的聯合，但也包括遷西等縣）等。在聯合縣內建立「中心村」，實行軍事共產主義，作為武裝與勞動結合的互助組織；又組織全民性的民兵，在熱遼山岳地區約 3 萬人的村民中，參加民兵與自衛隊的即達 2 萬人，形成了一個全民皆兵的社會，<sup>84</sup>並堅持在日軍劃定為「無人區」內的農地上從事農業生產，以儘量維持基本糧食的供應（但力求避免在日、偽「掃蕩」進攻中「三光」式的被消滅）。所以，每年 5 月或 6 月，共軍即出動協助村民完成春耕，但日、偽軍常來「割青苗」，一年二次、三次，而破壞了生產，但「無人區」的耕種仍然繼續下去。雖然「無人區」內「中心村」的糧產常不足供應村民的食用所需，但不足之數常可由長城線之南共軍控制的撫寧、遷安、遵化、平谷、順義等地所產剩餘的糧食，北運接濟，如 1942 年冬，北運糧食即達約 20 萬斤，其他日常必需品的鹽、火柴、布等，<sup>85</sup>也可用這樣的方式，源源接濟。對於日、偽在「無人區」內所建立「部落」，則派人滲透進去，做地下工作，使各「部落」成為「兩面政權」（即藉對傀儡政權中上層

<sup>82</sup> 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編，《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的暴行》（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頁 95。

<sup>83</sup> 姬田光義、陳平，前書，頁 185-187。

<sup>84</sup> 同書，頁 178, 186-187。

<sup>85</sup> 同書，頁 156-157, 181。

人員的寬大，以贏得他們暗中與共方合作：甚至白天為日、偽軍工作，晚上為共軍工作。<sup>86</sup>此外，共軍在最必要時也常做出最堅決、最頑強的戰鬥，絕不投降。例如 1943 年春節（2 月 4 日）時，日、偽軍破壞了承德之南的光頭山根據地，共軍一部即游擊分向赤峰之西北、隆化之茅荆壩、圍場之毛大壩等地發展，另一部則東向建平、朝陽地區發展，在建平之北建立新的游擊根據地。他們又另派人潛入吉林，連絡該地區的東北抗日聯軍。<sup>87</sup> 1944 年 9 月至 10 月，中共的黨政機構改組，將偽滿西南部地區與華北統一合併編制、統一指揮，而該地區的中共黨員數不減反增，如 1942 年，黨員數只有約 2 萬人，至日本投降時的 1945 年 8 月，黨員數則增至 49,520 人。共軍正規軍的兵力也大為增加，在日本投降、國土重光時，在冀東、熱南的五個軍分區內，有正規軍 5 個團和 1 個特務團，均由李運昌統率，民兵則有 15 萬人之眾；而在抗日戰爭之初的 1937 年 7 月／8 月冀東大暴動時，李運昌所能實際運用的兵力則不過 3,000-5,000 人。<sup>88</sup>

所以，當蘇聯於 1945 年 8 月 9 日向日本宣戰，以雷霆萬鈞之勢分路攻入偽滿洲國時，很快於 8 月 20 日進占瀋陽、長春、吉林，並進占旅順、大連及其他戰略要地，迫使日本關東軍全軍俯首降伏。第一批為配合蘇軍占領瀋陽與遼寧全省及吉林、黑龍江省境部分地區的中國軍隊，即為來自中共冀東地區曾經在長城內外抗敵多年、飽經風霜艱苦的李運昌部。<sup>89</sup>

---

<sup>86</sup> 同書，頁 189。

<sup>87</sup> 同書，頁 143。

<sup>88</sup> 同書，頁 105。

<sup>89</sup> 張宏志，《中國抗日游擊戰爭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頁 1027-1028 稱：中共冀熱遼軍區的軍隊首先進入新光復的東北，先控制了錦縣，解除了遼西 15 個縣的偽軍武裝，9 月 5 日並進入蘇軍占領下的瀋陽。該軍區的第二梯隊 5,000 人於 9 月 6 日進抵山海關，李運昌將軍率其所部 15 團於 9 月 14 日到達瀋陽。到 11 月底，共軍已基本上控制了遼寧全省、吉林南部與黑龍江省的西部。另參閱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4 年 1985），頁 374, 378, 387。